

主 编 ◎ 戴 伟
副主编 ◎ 周文德

国学原典

GUOXUE YUANDIAN DAODU

导读

GUOXUE

巴蜀書社

Z126.277
D133

国学原典

GUOXUE YUANDIAN DAODU

导读

000/86/07

主编 ◎ 戴伟

副主编 ◎ 周文德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原典导读 / 戴伟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3.12
ISBN 7-80659-547-3

I . 国 … II . ①戴 … III . 国学—研究
IV . 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454 号

策划编辑：罗 红

责任编辑：李 嘉

封面设计：何东琳

国学原典导读

戴伟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658275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电话:(028)8412220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00 千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659-547-3/Z·199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1
《尚书》导读	17
洪范	19
《周易》导读	31
系辞上	37
《楚辞》导读	55
山鬼	58
国殇	61
涉江	63
渔父	68
《诗经》导读	72
关雎	75
汉广	77
氓	79
蒹葭	82
采薇	84
生民	87
《左传》导读	92
郑伯克段于鄢	94

齐伐楚盟于召陵	99
宫之奇谏假道	103
晋灵公不君	107
齐晋鞍之战	111
祁奚荐贤	115
《仪礼》导读	117
觐礼	118
《礼记》导读	125
学记	126
博学	138
大同	139
诚意	143
《论语》导读	145
学而篇	151
为政篇	156
八佾篇	160
里仁篇	161
公冶长篇	165
雍也篇	167
述而篇	171
泰伯篇	174
子罕篇	177
乡党篇	180
先进篇	181
颜渊篇	184
子路篇	190
宪问篇	193

卫灵公篇	196
季氏篇	200
阳货篇	204
微子篇	206
子张篇	210
尧曰篇	212
《孟子》导读	214
孟子见梁惠王	220
寡人之于国也	222
齐桓晋文之事	227
庄暴见孟子	236
人皆谓我毁明堂	238
交邻国有道	241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244
以德行仁者王	249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250
尊贤使能	252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255
天时不如地利	257
君子不怨天尤人	258
许行	260
大丈夫	267
敢问友	269
人性	272
人皆可以为尧舜	282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283
民贵君轻	285

《庄子》导读	287
逍遥游	288
庖丁解牛	300
百川灌河	303
庄子钓于濮水	318
惠子相梁	319
胠箧	320
曹商使秦	325
《韩非子》导读	327
五蠹	328
《吕氏春秋》导读	356
察传	358
察今	362
《孙子兵法》导读	367
计篇	369
作战	373
势篇	377
虚实	380
《荀子》导读	386
劝学	388
正名	402
《战国策》导读	413
吕不韦与异人	415
冯谖客孟尝君	421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427
郭隗说燕昭王求士	431
《国语》导读	436

邵公谏厉王止谤	438
鲍叔荐管仲	441
勾践灭吴	444
附录	454
增广贤文	454
朱子家训	469
后记	471

绪 论

学习国学，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国学。在搞清楚什么是国学以前，先要搞清楚学问、学术、文化和科学等概念。

学问是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各类系统知识。学术则是指有系统的比较深厚和专门的学问。学术的分类就叫学科。我们认为：学，是指理论知识；术，则是指直接用于生产操作的知识。比如“水是有浮力的”，就是“学”，而用这一道理去造船，就是“术”。汉语的“学术”一词，单从字面上就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髓。我们常常说“学术氛围”，指的就是学习、研究和探讨有系统的比较深厚和专门的学问的那么一种氛围，而不是一般的涉猎性的读书，更不是庸俗的趣味知识竞赛和夸夸其谈的神侃等等。学术氛围要精心营造才行，不是靠“作秀”就能够装点门面的。

文化的概念则比较复杂。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仅仅是泛指一般知识，常常是指语文知识。比如，“学文化”，就是指学习语言文字和求取一般的知识。又比如，对于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就是指某人的语文知识和一般知识的程度。正式的、书面的“文化”的含义，则比较严谨和规范，可以分为狭义的文化和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服务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等。有

时也可特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建设制度和硬件设施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其特定的论述对象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大的地区和民族，当然也包括在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的地区之间或者不同的民族之间的精神、物质差异。我们在正式场合下所说的文化，往往就是这两种情况，狭义的和广义的都在用。

科学是指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按这种理解，正如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一样，科学的对立面就是愚昧。基于此，我们应该把科学看成神圣的、理想意义上的终极追求，它的伟大的光环，应该照耀着我们整个的人类，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人们通常把科学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综括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我们认为，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大类更为合适。

一、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一般又可以具体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大类。基础理论科学有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机械学、工程学、建筑学、医学、勘探、采矿等。

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思想政治、管理学等就应该属于社会科学。

三、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概念源出于拉丁文 *humanita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在 15、16 世纪时就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意是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神学，以后人文科学的

含义几经演变，我们认为，今天的人文科学应该是指哲学、历史学、逻辑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等学科，它同自然科学相去甚远，也不等同于社会科学。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文科”就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概括进去了。人文科学应该是有别于“社会科学”的。

每一门科学，每一个学科领域，每一个专业领域，都有成千上万的专业人才，都有为数不少的学者，都有站立在高山之巅的大师。成为专业人才，成为大师和学者，正是青年学生奋力追求的目标。从就业市场和社会需求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比较实惠和时髦的，而比较受冷落的则是人文科学。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人文科学的魅力更加深沉和持久。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建者亚伯拉罕·夫莱克斯勒说：“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翻译成中文就是：“没有用的知识的有用性。”这正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大学和研究所应该成为人类高贵精神的守护之所，应该成为最为先进、最为精粹的思想的源头。

再来看什么是国学。

所谓国学，是指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学术文化，一般认为国学还应该包含现代有关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国学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学术，它的对立面应该是“西学”。

“国学”这个词，作为一种学制，是西周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后来是京师官学的通称，指太学和国子学。但是“国学”一词作为今天我们常用的学术、文化科学的概念来说，则始于清代后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才有“西学”与“国学”之分。当时欧美文化传入中国，西方传来的学术称为“西学”，与之相对，我们本国固有的学术就称为“国学”，亦称为“汉学”或“中学”。张之洞有所谓“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的主张，正好说明了国学的对立面就是西学。一般说来，“国学”是中国人对本国学术的自称，“汉学”则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称呼。两者之别，只在名称上，它本身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认为，国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其范围包括所有的中国学术，涵盖古今，包罗万象，其范围相当广泛。也就是说，上面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只要是中国的，都是国学。我们以清代姚鼐对中国学术的分类来看，国学大约有如下门类：

1. 义理之学。这是国学的主体，指思想政治、道德修养、管理学、宗教、哲学等，包括经学、史学、玄学、佛学、理学、哲学等。

2. 考据之学。这是工具性的学问，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金石学、敦煌学等。

3. 词章之学。这是文学艺术之学，包括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散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俗文学、文学批评等。

后来，曾国藩在姚鼐这三大类之外又增添了“经世之学”（即经济之学）。其内容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兵学、政学、历算学、博物学及自然科学等。国学的范围至此可以说是十分完备的了。国学的范围很广，包括全部传统的中国学术，也包括了中国现代新的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与时俱进，国学的范围不断扩大，学术视野更加深远。国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僵化和腐朽，而是具有开拓性的，它是一种推陈出新、兼容并蓄、可以同世界文化相融合的伟大的学术和文化。国学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总成。只不过，我们的先辈们往往更重视的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把它们看成“形而上”的东西，高雅、正统、正宗，而把自然科学看成“形而下”的东西，低俗、实用、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可是实际上，像《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数学典籍，《山海经》、《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地理典籍，《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荆楚岁时记》等工程、农艺典籍，《金匱要略方论》、《伤寒论》、《脉经》、《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在中国科学文化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格物致知”之学的典范，是“形而下”的杰出代表著作，也是国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狭义的国学仅仅只是一种人文科学，它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我们的《国学原典导读》所讲授的东西，基本上是狭义的国学。因为我们古代、近代的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就其学习价值来看，已经不大了。而古代的法律、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理论等，对我们今天而言，也不是很有借鉴意义，更没有什么推广的价值。有的人一味鼓吹我们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去学习，我们认为这种主张不对，或者说不全对。牵强附会，生拉活扯，硬把我们今天该做的事都贴上古代标签，都跟古代联系起来，这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荒谬的。所以，我们把狭义的国学定为我们学习、探讨的重点。狭义的国学才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粹，到现在也不会过时，甚至到将来也不会过时。

有很多人，一谈起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化，就是唐诗、宋词、元曲，其实，这只是中国古代中期和后期中国文学的几个高峰而已，局限于文学，甚至只局限于诗歌。我们现在要谈的国学，它

的核心是“经”，也就是经书。最近教育界有人在推崇“读经”，甚至提倡在小学生和中学生中掀起读经的热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这种主张，我们不敢轻易附和。但是，“经”的重要性却是不可抹杀的。

“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常典，是一种可以为日常生活与行为规则的典范。我们常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演周易、作春秋，但孔子却没有把它们定名为“经”。最早确定“经”的名称是在《庄子·天运》里孔子对老子说的话：“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虽然《庄子·天运》的真实性受到多方质疑，但最迟至战国末年就有了“经”这一名词，那却是毋庸置疑的。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这是最早以“经”当做书名的开始。到了东汉，因为古文学家的提倡，加上了一个《乐》，就有了所谓的“六经”。唐代时，在六经之外又加了《孝经》，成了“七经”；随后又有人把三礼及春秋三传列入，和诗、书、易并称而有“九经”；五代时又加上《论语》、《孝经》和《尔雅》，就有了“十一经”及“十二经”；后来，再多加了一本《孟子》，而有“十三经”之称。因为“十三经”立名已久，因此，成为时人公认的经学标准。清代阮元根据最先的“十三经”宋刻合本以及后来的明朝嘉靖、万历刊行本，撰写了《十三经注疏》，并附《校勘记》，这是我们今天最为推崇的经书合订本。

经书是记述天道人事之“常理”的书。《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儒家的“经”最被世人尊重和崇敬，是中华民族在有文字以后若干年来历代先贤们智慧的总记录和文化累积的总典籍。中国文化的形成，经书是最基本的根源。中国人的思想和美德，以及学术发展，也是渊

源于这几部经书。我们认为，这些经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和思想价值。

中华文化的主要精神和轮廓在先秦就已经完成。西周社会一向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的法典，它以字里行间的褒贬来约束和控制“君子”（即贵族）的行为。刑，则不然，它有相当残酷的严格惩戒，它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即平民）。这就是《礼记》中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在西周以后的几百年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孔子的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了土地和爵位，又有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顺利地成为社会上、政治上的新的显要人物。就以孔子的家族而言，也是这样。孔子的祖先本是大贵族，几代以后，沦落为平民，一直到了孔子的父亲弗父何，他到快六十岁时才因军功而获得了一个最低的贵族头衔——武士。社会各阶级原有的固定性被打破了，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进行战争、准备战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其结果，就是政府的机构和功能比以前更加复杂和完备。到东周以后，国家权力已经不再定于一尊，而变成群雄争霸的局面。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争的是霸权，霸权就是所谓的“执牛耳”之权，“执牛耳”就是盟主。各诸侯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shà）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到战国时期，是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时代，霸权主义鼎盛，合纵连横之说盛行一时。各国的国君（当时已经开始称“王”了）都在不遗余力地收罗人心，网罗知识分子。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空前紧俏，有的人还在几个国家挂职。当时，最紧俏、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恐怕要算苏秦了，他竟然

一个人挂了六个国家的相印。

当时各国诸侯面临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自孔子以来的大小的知识分子，那些诸子百家，他们共同努力要解决的就是这些棘手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国家、对万事万物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或提出利国利民、开疆拓土、强盛国力的各种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如此的五彩缤纷、光辉灿烂。

我们经常提到的“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俗称的“九流十家”就是从这里来的。“九流十家”中最重要的、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儒、道、墨、法四家。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很有名，可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系统的、很成熟的学习了。

儒家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孔子在中国，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在40岁以前，他的主要活动是教书。42岁那年，

带着数十乘车马、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晚年才回家著书立说。今存《孟子》七篇就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体现。孟子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要恢复周代的制度，认为古代比现在好，要人们“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因为孔子和孟子的主张都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国君都认为不合时宜，故都没有受到重用。在先秦之际，儒家学说并不是很吃香。自秦以后，汉初立国，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都不是很感兴趣。

研究孔子儒学不仅可以古为今用，为实现我国现代化服务，而且对全人类未来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指导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把儒学创始人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1988年1月，全世界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联合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儒家的另一派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尊为荀卿，有《荀子》一书。他应该是介于儒、法之间的人物。他赞扬富国强兵的政策，尤其赞扬秦国，对孟子的陈旧学说有过激烈的批评。针对孟子提出的“性善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反对孔孟空谈仁义道德，无疑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也相当激进，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荀况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认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民，在没有给它利益之前就从它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人民利益然后再从人民中索取利益。他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者可得而官也。”（《富国》）“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制》）这样，国家的政